



王学泰 著

监狱琐记

生活·读者·新知 三联书店

王学泰 著

监狱琐记

生活·读书·新知 三联书店

Simplified Chinese Copyright ©2013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

All Rights Reserved.

本作品著作权由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所有。

未经许可，不得翻印。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监狱琐记 / 王学泰著. — 北京 : 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, 2013.10

ISBN 978-7-108-04527-0

I. ①监… II. ①王… III. ①王学泰 - 回忆录 IV.

①K825.81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3)第088536号

责任编辑 饶淑荣

封面设计 罗 洪

责任印制 郝德华

出版发行 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

(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22号)

邮 编 100010

经 销 新华书店

印 刷 北京市松源印刷有限公司

版 次 2013年10月北京第1版

2013年10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开 本 880毫米×1230毫米 1/32 印张9.75

字 数 196千字

印 数 0,001-8,000册

定 价 28.00元

小 引

东坡有诗云：“人生到处知何似，应似飞鸿踏雪泥。泥上偶然留指爪，鸿飞那复计东西。”人生真是如光如电，还没有盘算一生何以自处，似乎生活还没有迈开脚步，便已经两鬓斑白，光荣退休了。现在工作停歇了，但大脑依然活跃，人老了，忆旧几乎是不可避免的。当独坐无事，或躺下难以安眠的时候，往事就像过电影似的一幕幕出现在面前，真是酸甜苦辣。仔细思量，以苦为多，可是现在想起来却不感到悲哀，大约正像俄国诗人普希金的名诗《假如生活欺骗了你》中所说“而那/过去了的，就会成为/亲切的/怀恋”。

我们这一代所经历的是个后世难以理解的大时代，也就是社会大转型的时代，怎样完成这个转型？言人人殊，许多人不仅是“言”，而且起而行之。这样，在短短的一百年中，不停顿地改革、维新、造反、革命、革革命……生在这样的时代，个人、特别是普通人简直如一粒尘沙，可以忽略不计的。个人的生活或

说自己对生命的安排是不需要、不必要、也不可能的。一生或者听从他人摆置，或者任由命运拨弄。我的前半生沉浮都是由外部力量决定的，如同汹涌波涛中的一叶小舟，不知道方向，也不知道彼岸，飘飘荡荡，一晃几十年。回忆起来，没有业绩，没有收获，甚至没有历史，没有痕迹，留下的只有一些不太清晰的模模糊糊的记忆，真似飞鸿踏雪，那计东西。这里采撷一些片断，免得雪融冰消，只“落了片白茫茫的大地真干净”。

目 录

小引	1
一 “复杂”与“故事”	1
二 我的第一个“监狱”	10
1 “监狱”的分类	10
2 山雨欲来	13
3 我的第一个监狱	17
三 我的第二个监狱	26
1 摩托车上间隙	26
2 半步桥边 K 字楼	28
3 “号间门偶向人开”	34
4 预审、逮捕、审判	37
5 K 字楼的吃	46
6 K 字楼中的日常生活	51
7 K 字楼中的犯人	55
8 上诉期，地震与悲痛的父亲	79
四 我的第三个监狱	89
1 北京第一监狱	91

2	“文革”末期的监狱	95
3	初进三中队三小队	108
4	编写节目	125
5	三中队其他犯人	136
6	狱中来了新犯人	159
五	监狱常事拾零	204
1	会见	204
2	在监狱中患病	207
3	大墙里面看电影	213
六	平反现场	219
1	改革的先导——平反冤假错案	219
2	平反现场	221
七	北京市高等法院接待站	228
1	归来	228
2	市高法接待站	230
	附录一 生活的第一课	233
	附录二 鲜为人知的“反动学生”案	241

附录三	1963年—1966年的大陆高校清理“反动学生”事件	260
一	缘起	260
二	铺开	264
三	“罪行”	268
四	处理	272
五	改正	275
六	重聚	278
附录四	野驴顾惟乔	281
一	独特的1960届	281
二	好强的、积极的顾惟乔	284
三	博学的顾惟乔	286
四	悲惨的顾惟乔	287
附录五	号子里的战争	
	——评《号子里的人》	290
附录六	读者陈建新推荐有关张建旗下落的文章	294
后记		300

一 “复杂”与“故事”

1980年初，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恢复学术刊物《文学遗产》，通过考试，编辑部赞同我调入文学所。当我的人事材料在所务会议上讨论时，七位所领导都同意（五位正副所长、两位书记），人事处一位领导却有不同意见。她说，王学泰历史太复杂，到社科院来工作不合适。老所长陈荒煤先生说，他连“三青团”都没参加过，有什么复杂的？还不是我们把他弄复杂了。陈先生说得对，北京解放那年我才六岁，上二年级。连参加童子军都不够格，遑论“三青团”！每天早晨上学，看见童子军，戴着圆形帽，手执军棍，腰间皮带上系着法绳，在学校门口检查学生的风纪，手是否洗了，脸是否干净，十分认真而神气，还有点羡慕呢。“童子军”是那时最低龄的组织了，我也只有受他们检查、管理的份儿。

其实，我的历史真的不复杂，可以说七岁以后，不敢说每天、但可以说每个月都能找到证明人。活了六十多年，从学校门，到单位门，没有离开过国门。一辈子没有参加过任何组织，包括“文革”当中，五花八门的组织林立的时候。然而，那位人事处领导说的也不是没有一点道理，这应了凤凰电视台“世纪大讲堂”主持人曾子墨女士的一句话，她说：“王学泰先生的故事很多。”这是三年前我在该讲堂作讲座时，她向观众介绍我的一句话。我说：的确，大故

事，或说大事故，有三次。

第一次是1958年10月。我读高中，下乡劳动，深翻土地，种小麦高产田，来年要亩产120万斤。当时我说，一麻袋最多能装200市斤小麦，120万斤可装6000袋。一袋平放在地上占地6平方尺，一亩地可平放1000袋小麦，6000袋要码6层，相当一房多高。我问什么样的麦秆能把这6000袋小麦挺起来呢？那时是组织军事化，这话是我在“连队生活会”上提出的疑问。连队汇报到团指挥部，带队劳动的是一位留校学生，刚被提拔为教导主任，颇带点“少共”意味，有决断，多激情。他听了之后勃然大怒，认为这不是与党唱对台戏吗！竟敢怀疑“大跃进”，不相信党报上宣传的“人有多大胆，地有多大产”！这是政治错误，必须严厉批判，肃清流毒。于是召开我校下乡劳动的全体同学开辩论大会（当时风行“社会主义大辩论”，动不动就要“辩论”，实际上就是批判），“辩论”我的“反动言论”。许多同学慷慨激昂，上场发言。大会收尾时，那位新提拔的教导主任（当时称作“团政委”）当场宣布，把我开除回校，不许我在这里给“大跃进”泼凉水。这是我在众人面前的第一次“亮相”。我低着头，有时也偷偷看一眼下面的同学真正的或故作气愤的面孔，感到很意外。待回到城里地处骑河楼的学校，留校的师生正在做大炼钢铁的准备，我怕被同学问起，就没有回学校，每天跑“北图”看书，以消磨时日。下乡同学回校后又在班上开了一次批判会，这时又加上一条新罪行，就是逃课、逃避“大跃进”。那年我十六岁，正是充满了奇思异想的季节，这是生活给我上的第一课。

第二次是1964年7月，大学毕业之时。从1962年秋天，强调“阶级斗争要天天讲”以来，形势一天紧似一天。从学校领导、教师

到学生都学会用阶级斗争的眼光看待一切，扫描一切，关注周围同学的一言一行。我所在的班，因为1962年秋选举班干部时，没有完全服从系总支的安排，在一些人的策划下，选了一两个违背领导意志的班干部，这就成为近似“反革命事件”的“选举事件”。1963年北京市委大学工作部研究高校的阶级斗争时，把这种“选举事件”视为资产阶级向党进攻的信号（1962年北京有一些高校的个别班级没有按照组织的意图选举班干部，后被定性为严重的“阶级斗争”）。面临毕业时，我们这个班（我所在的班级有同学近百人）一些“选举事件”中的“积极分子”都有些紧张，预感到要被整。毕业之前的几个月里北京师院中文系毕业班中剑拔弩张，充斥着紧张气氛，系里领导做出了“打人状”，许多同学都有不祥的预感，觉得毕业这关不好过，非得脱层皮不可，有些人就做好了挨打的准备。

1964年的大学毕业“鉴定”与往年不同的是，在鉴定之前，先搞了一个“清理思想运动”，应届毕业生在“清理思想”的基础上再作鉴定。这个运动的公开“说词”是每个同学要在毕业前，把上大学几年来的资产阶级思想清理干净，轻装走向社会，投入到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建设中去。前年，我在北京档案馆查资料时，看到了北京市委大学工作部领导吴子牧1964年7月18日的关于本届大学毕业生“鉴定问题”的讲话原稿。他讲这次鉴定的目的就是考察学生“政治思想、立场方面的根本问题”，以供领导掌握。要求下面主持学生思想工作的领导要特别注意清理有关“困难时期”、“三面红旗”、“国际反修斗争”等方面的“错误思想”和“反动思想”。要写上档案，“可供使用人单位对他了解”。对于那些通过“保卫手段”所获得的关于学生的“反动思想内部掌握的材料”，不必找学生谈，

但要“暗挂，作为人事材料”转到任用单位去。可见当时“清理思想”和“毕业鉴定”的真正目的是加强对大学生的思想控制。

由于上面抓得紧，下面的运动自然也就搞得轰轰烈烈。自觉有问题的学生在老师和同学的帮助下一个个痛哭流涕，做检查，痛骂自己的过去，以求过关。在我看来有些像滑稽戏。然而奇怪的是我无论怎么检查，自觉得已经很深刻了，但也没有人理，也不说过关了，也不说不让过，有点晾起来的意思。直到清理思想运动告一段落，8月上旬一个阴雨的下午，系总支召集中文系全体毕业生（近四百人）宣布：运动转入解决敌我矛盾问题，从清理思想到清理“反动学生”。接着，总支书记陈某宣读中共中央转发的北京市委清理“反动学生”的文件。于是，先是全班、后来是全系，把斗争的矛头指向了我。其实，有什么大不了的问题呢？北京有句俗语叫做“拣鸡毛凑掸子”，是说把日常鸡零狗碎的事情凑在一起，有时也很有点规模呢。我平常又爱聊天，言多必失，凑个“掸子”还是很容易的。

在大抓阶级斗争之时我被上面关注，既不偶然（如上面说的“爱聊天”，有时也爱说些“风凉话”，这是在大抓阶级斗争时必然会被注意的。这类人在内部排队时，最佳也得排个“中右”，弄不好就被视为右派），也带有些偶然性。我在北京工农师范学院上学（这个学校在1962年被并入北京师范大学）时，与张闻天唯一的男孩张虹生同宿舍，床头相对，熄了灯也能说话。张虹生由于幼年遭遇（1942年后在新疆坐监狱3年），脾气不好，得罪过系里领导和某些教师，但与我关系不错。当时处在困难时期，天天饿肚子，我们经常一起去饭馆改善生活。在吃饱饭后，就是谈天说地，这样就难免言及困难的根源和党内高层的斗争。从他那里得知，遵义会议后，

原来张闻天是党的一把手，毛泽东仅仅是协助周恩来处理军事问题的第三四把手。他谈过对于“三面红旗”、“反修斗争”等重大问题上党内高层是有不同意见的。像后来尽人皆知的“三分天灾，七分人祸”“人相食，是要上史书的”和在庐山会议上对彭老总不公正的批判，当时我就知道了。这些信息在正常社会中人民是有权知道的，可是在当年这些都属于高层机密。

另外，我有几位校外的朋友，到了假期经常凑在一起聊天，无话不谈。从张虹生那里获得的信息自然也就扩散到这几位了。1957年反右之后，青年学生大多也都有了自我保护意识，不会在大庭广众之中说一些主流思想不能允许的话。真正的思想交流也只在亲戚或没有利害关系的朋友之中进行。那几位校外的朋友都是从小一起长大的同学，而且不在一个大学里读书。上面说的“偶然性”就表现在原本无利害关系的朋友，突然变成了有可能发生利害冲突的同班同学。1962年工农师院与北京师范学院合并，那几个朋友中的一位恰好与我同班。当然在一个班里并不是说他一定会揭发我，又赶上“清理思想”这个机缘，而且我俩都与班上的“选举事件”多少有点瓜葛，同时受到“清理思想”领导小组的注意；最后一个机缘是：领导小组中有个下班协助政治辅导员的助教鲍某，对我和同班的那位朋友都有所了解，他又想制造点业绩，于是使用各种方法，动员那位朋友揭发我，这些机缘都凑在一起，肯定还是属于“小概率事件”。身陷这“小概率事件”中，只能自叹命运的捉弄，而系里的领导则庆幸“抓住一条大鱼”（当时总支书记语）。

这一年全校毕业生总共一千余人，公开被定为“反动学生”的只有我一个（听说仅中文系每班还有“内定”“反动学生”两名，全

系共 8 人)。平常在学校里默默无闻，这一次真是臭名远扬了。1949 年后的三十年中全国的政治运动有五六十次之多（有兴趣的可参见我的《说运动》一文，收录在我的随笔集《采菊东篱下》中），许多运动（如整风反右）有时也烧到学生、特别是大学生。但专门以大学生为清理整肃目标的是从 1963 年到 1965 年的清理“反动学生”运动。1978 年底听高教部学生司负责人说三年共清理出一千多人。被清理出来的学生，不算合格毕业生，不能毕业，分四等处理：①劳动教养 3 年，②劳动教养 2 年，③劳动考察 3 年，④劳动考察 2 年。我是劳动考察 3 年，由北京市高教局组织到农场劳动。因为“文革”，拖到 1969 年初才又回到学校，1971 年分配到房山。

第三次最为严重，发生在 1975 年初。1972 年到 1973 年，“文革”虽未结束，但政治环境稍显宽松。因为自 1971 年 9 月林彪出事以后，除了极少数人外，大多数人感觉到没有从流行的革命中得到什么好处，反而都有不同程度的损失。往常激烈的信仰，日渐流失，人们平静下来后，更加感到往日的荒唐。虽然，每个人到了单位依旧是粉墨登场，各自演好自己的角色，但私下里，却敢于悄悄地说些真话，以求得心理上的平衡。我们这些普通人如果一天 24 小时除了睡觉外，无论对谁、无论在任何场合，都说假话，心理上是难以承受的。真是“一个人说点假话并不难，难的是一辈子都说假话，不说真话，几十年如一日，这才是最难最难的啊”。也许只有大人物才能做到像邵燕祥先生所说的“口吐铅字”，永无真情实感，而普通人是绝对做不到的。

大约到了 1972 年、1973 年，人们心理承受度已经达到极限，又没有正当的发泄渠道，于是以前的道路以目、腹诽变成了现实的言

语：流言、非议、小道消息，也有谩骂诽谤（正是这种情绪酝酿了后来的“四五”）。即使最胆小的人，有时忍不住也要骂一下社会上的极端表现（当时视为革命行动），只不过最后还要加上一句“这些极‘左’的都是林彪那些人搞的”。这样好像就安全了。当然，我也不能免俗，因为都是普通人，就难免会做一些面上毫无表情、私下里叽叽喳喳——不合君子规范的俗事。我最反感的是“批林批孔”，连震撼千古的“风萧萧兮易水寒，壮士一去兮不复还”都能改成“小丑一去兮不复还”，夫复何言！更可笑的是，当时批判什么都能挂在孔子的账上。如批“走后门”就联系“子见南子”；批“男尊女卑”联系“惟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”；批“英雄史观”联系“天生德于予，桓魋其如予何”；批“复辟倒退”联系“觚不觚，觚哉觚哉”，可笑之极，可耻之至！

1974年《人民日报》元旦社论中指出“批林，批判林彪路线的极右实质，就是批判修正主义”。当1973年除夕夜听到这篇社论的广播时，便感到风向要变，会更加极端。果然不久就是“批林批孔，评法批儒”。但这次的极“左”，很少有下面的群众响应。从上面极端主义的言语作风看（例如为了避免“卫星上天，红旗落地”，要搞“全面专政”等），好像要重新点燃群众的革命激情，回到1966年去。然而1972年以来，民间的不满、各种议论和小道消息的传播却渐渐形成一种惯性，不能停止。而上面把这些看做是“资产阶级的反攻倒算”，不断地增加打击力度，并时时以“要注意阶级斗争新动向、路线斗争新动向”告诫下层领导。而且各部门、各地区也在不断地以各种方式打击各式各样的“阶级敌人”为执政要务，当然北京也不例外。在这种险恶的政治背景下，有一个偶发事件，我被牵

连进去了。

这次事故最大，我被列为打击对象，没有经过群众运动，一步便跨到专政机关。先是被房山县公安局传讯，再是被北京市公安局拘留。1976年“四五事件”之后，在所谓“批邓、反击右倾翻案风”的运动覆盖中国大地之时，5月10日我的问题的性质再次被升级，填了逮捕证（“文革”当中往往“以拘代押”，不逮捕，只在看守所拘留，亦有长达数年者）。由北京市中级法院提审，于7月26日，被判有期徒刑13年。平反后，听我弟弟说，你的案子拿出来交群众讨论了，他的一个在友谊宾馆工作的朋友看到过。那时凡是“交给群众讨论”的案子，都有几分凶多吉少。我的案子经过这番讨论，应该是众所周知了。不过除了原先就认识我的人，光凭“讨论材料”中所著录的“恶毒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，污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和批林批孔运动”，谁也不会因为这几句空洞的罪行记住王某的。因为在大批判中、在“清队”中、在“一打三反”中，乃至在一般的日常生活中，人们早已听惯了这种指责，没有什么人会认真对待的。我所在工作单位房山文教系统的人们大为吃惊，怎么就出了这么一个被判13年的“现行反革命”呢？从我判刑的7月26日起就准备召开全县批斗大会，不过这个会，命运多舛，最后夭折。先是7月28日大地震，大家抗震，顺序后延。后定在9月10日召开，不料，9月9日毛主席逝世，紧跟着“四人帮”倒台，于是，批斗我的全县大会也就不了了之了。

记得汪曾祺先生说过一句话：“幸亏划了右派，要不，我本来就平淡的一生就更加平淡啦。”汪先生生在高邮，经过抗日、辗转大西南，跑过日本空袭警报，进入过“西南联大”，受过一些前辈大师的

亲炙，跟着沈从文先生学写小说，后来又写样板戏《沙家浜》，至今传唱不衰，小说更是别具一格。他尚如此说，至于像我这类1960年代成长起来的大学生，受的是驯服工具论的教育，又欣逢不许读书的年代，用李泽厚先生1979年在《鲁迅思想分期》一文中的话说是属于“长期在外力和内心压力下，知识少而忏悔多”的一代，与汪曾祺等前辈相比只能更加平庸，更没有谈谈过往的资本。“幸亏”有了这三次挨整，见过了许多世面，听到了许多闻所未闻之事，也见到了一些难得一见之人，也就是“怪人”〔1〕。这还是同辈人中经历所不多见的，有时说起来，如同“进了几回城”的阿Q可以夸示于未庄的小D、王胡一样，也不免堕入“津津乐道的恶趣”。然而，我有一点是真诚的，就是希望后辈别再有这样的经历，中国再别发生这一类的故事。下面就开始说监狱里面的故事。

〔1〕那个时代最倒霉的不是好人，更非坏人，而是“怪人”。如果一个人身上稍稍有些异于大多数人的东西，不论好坏，就易于成为被吞噬的诱因。我的行为尚不能说“怪”，但在思想上或气质上总被认为是有些不合群的，众人看起来就有些别扭。而合群的国人历就有改变异端的冲动，“改男造女”运动给这种冲动提供了方便，这样怪人往往首当其冲。谓予不信，读者可以根据你的生活经验看一看历次运动中的倒霉者，分析一下。被整过人中的好坏程度与没被整的人的比例差不太多，但被整过人当中不同于众的比例则非常高。